

林毅夫 等著

新结构经济学文集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议：经济学
ISBN 978-7-5432-2176-5

9 787543 221765 >
定价：1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格致网：www.hibooks.cn

林毅夫 等著

新结构经济学文集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结构经济学文集 / 林毅夫等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5432 - 2176 - 5

I. ①新… II. ①林… III. ①结构经济学-文集
IV. ①F014.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0382 号

责任编辑 葛 智

新结构经济学文集

林毅夫 等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www.hibooks.cn
www.ewen.cc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5
插 页 4
字 数 835,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2176 - 5/F · 582
定 价 128.00 元

代序：春风化雨 师恩如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展组

林毅夫老师 1979 年只身从台湾来到大陆，进入北大学习，后来获得了舒尔茨教授（1979 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赏识，被推荐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国际上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在我们有幸成为恩师嫡传弟子之前，恩师的渊博学识和行为典范早已耳熟能详。在十余载的追随中，恩师的谆谆教诲指引和影响着我们，我们也有幸见证了恩师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成长历程。

理论创新 一以贯之

恩师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是其经济研究的发轫之作，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7 年，恩师学成归国，其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恩师发现如果生搬硬套主流经济学现有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仅很难有创造性的新观点，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牵强附会。

1988 年，中国经济过热，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后首次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政府应该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和鼓励储蓄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却是“砍项目、砍投资”等貌似不合经济理性的治

* 代序由张鹏飞执笔，王勇、陈斌开和徐朝阳等其他发展组成员亦有贡献，林毅夫教授审阅了全文并就代序中涉及的学术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

理整顿措施。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选择了和主流经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做法呢？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促使恩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当时，对计划体制的形成一般都归结为意识形态。然而，恩师出访印度的经历使得他彻底摒弃了这种看法。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印度也有计委，其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雷同。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及与各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恩师认识到：“导致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及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推行这个战略，政府只能实行扭曲各种价格信号、资源计划配置、剥夺企业自主权甚至实行国有化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 1988 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恩师对上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其后，恩师开始围绕上述思路和蔡昉、李周两位老师开展合作研究，撰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成名经典之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该书从发展战略与要素禀赋的矛盾出发，详细剖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该国要素禀赋的特性相一致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模式以及经济绩效的关键。该书已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越南文和俄文在国外发行，并且成为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众多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2001 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 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前去演讲。恩师于同年 5 月应邀做了这个讲座的首讲，题目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在这次讲座中，恩师首次将“自生能力”作为标题。自生能力是恩师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早在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就广为运用，在 1999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合作者谭国富教授）一文中则被正式定义。通过引入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分析的基础，恩师不仅对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还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战略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发展战略与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方方面面领域的理论框架。在刘明兴及其他师兄的协助下，恩师在

讲座中还通过构建技术选择指数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程度，并利用跨国数据对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讲座的理论结论，为恩师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200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教授在听完讲座后作了如下的评论：“林的演讲说明了过去15年来的‘新发展理论’^①是没用的；按照他的研究，甚至芝加哥大学许多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是没用的”（原文刊登于讲座后第二天的芝加哥大学校报 *Chicago Maroon* 上）。

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恩师应邀赴剑桥大学在2007—2008年度的马歇尔讲座上发表题为“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的演讲。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挑选一位担任主讲人，恩师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第一位华人，也是第二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马歇尔讲座的60多位主讲人中已有15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在讲座中，恩师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完整地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揭示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制度结构→发展绩效”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在张鹏飞、陈斌开及徐朝阳等弟子的协助下，恩师还构建了一个赶超战略和“三位一体”计划经济体制的数理模型作为附录。此讲座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加里·贝克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008年6月，恩师前往世界银行就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成立60多年来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就任之初即遇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世行的工作要求促使恩师对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理论思潮的框架。

二战结束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建立之初，结构主义的观点占据主流，认为由于诸多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发的力量，发展中国家无法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现代产

① 即内生增长理论。

业，因此，主张以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的产业。在这一波的发展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初期的投资拉动型快速增长，其后，则普遍遭遇到了增长停滞和频仍发生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由市场的思潮开始在理论界和政策界中抬头。尤其是80年代初“休克疗法”的改革在委内瑞拉取得成功之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主流思潮，主张以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改革，克服政府失灵，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迅速建立起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改革在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甚至导致了经济崩溃、停滞和更加频仍的危机。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发展和转型情况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一些取得成功的例子，其共同的特点是采取了从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政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是按照结构主义的主张，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直接去发展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而是采用了出口导向的战略，从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实现了逐步但快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结构和收入都已相当接近甚至达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同样，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越南在80年代开始的转型，没有遵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被主流学界认为是最糟选择的“双轨制”，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实现了转型期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就像“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那样，市场确实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和辅助作用。

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思潮和总结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的基础上，恩师倡导“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回归到亚当·斯密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意图不是按《国富论》的观点来发展经济，而是按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恩师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设置的不断创新和结构变迁，他主张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产业、技术、制度结构不同及结构变迁的原因。按现代经济学的惯例，这样的研究应取名为“结构经济学”，加一“新”字以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第一

波思潮——结构主义。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恩师主张从禀赋结构为出发点来分析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结构，除了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外，他还将基础设置引进一个经济体的禀赋之中。基础设置包括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力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等——和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如制度、规则、社会资本、价值观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是：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时点是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同时决定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和要素相对价格，给定该时点的全球可用技术和产业，这个禀赋结构也就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技术结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因而，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第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有与其特性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时，并不一定要一味照搬发达经济体中的产业和基础设置。第四，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第五，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有价值的公共知识；同时，各种基础设置的改进无法由一个企业单独进行。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基础设置的完善上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功能，或扮演提供者的角色，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顺利进行。

正是在对发展经济学第一波和第二波思潮的批判和继承，以及对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成败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恩师提出了一个以各国禀赋结构为前提，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产业和制度结构内生决定为出发点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分析框架，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严谨且富有创见的道路，并在世界各国的学术演讲、政策讨论及与政府首脑的会见中进行宣讲。2011年，恩师接受了耶鲁大学的邀请，向全校师生作久负盛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全面阐述了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

帮助本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提出了六点具体可行的操作框架,在校师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除了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外,他还利用世界银行工作之便,协助相关国家进行试点,探索可持续、包容性的快速发展道路。令人振奋的是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已经开始被一些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所采纳,并且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发展理论思潮,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各国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分析框架。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们有责任沿着这个框架不断深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扩大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国外理论和政策界的影响。

教书育人 桃李芬芳

2012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林老师回到了他热爱的教学研究岗位。在学生们眼里,“喜欢教书、关心学生、循循善诱”是恩师的一大特点。“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这是恩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赴世行上任之前,恩师每年坚持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和研究生合开《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并给研究生开设《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等课程。

在每个星期五晚《中国经济专题》课上,500多个座位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教室的过道和窗台上也坐满了听课的学生。在《中国经济专题》课上,恩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以及课后对学生提问耐心细致的回答深深打动了听课的学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3年12月,恩师以接近全票、并遥遥领先第二名的绝对优势当选北京大学第九届“十佳教师”。恩师获奖无数,且其中不乏重大奖项。然而,恩师对这个由北大学生投票选出的民间奖项却格外珍惜。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非典”肆虐,人心惶惶,就连平常熙熙攘攘的长安街也空空荡荡,行人稀少。当时北大许多课程已经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然而,恩师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1级研究生开设的《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却照常上课。唯一不同的是:在每次上课前,恩师总是会请同学们帮忙打开万众楼大教室的所有门窗以利于空气流通。事后,上课内容整理成为了《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发展战略》(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

恩师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严谨性以及理论推论和外部现象之

间的一致性，因此绝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都能接受他所提出的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的现有理论的新观点。然而，同学们出了课堂往往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套用现有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当发现理论之间存在冲突时，时常感到困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感于此，恩师特别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学生们分享。恩师经常引用《老子》中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来告诫学生们在学习现有理论时必须秉持“常无”的心态。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恩师要求自己的学生在观察和解释一个经济现象时，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出发，而是直接去了解现象、分析现象，发现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所拥有的可能选择，以此来揭示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恩师始终认为：学生们唯有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才能把自己真正培养成既能正确应用现有理论、又能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考虑到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恩师还在 2003 年秋季学期的《转型经济学》课上专门腾出时间，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2 级的研究生们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数场对话。根据对话内容整理成的文稿出版了《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200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

作为恩师的入门弟子，除了上课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时间与恩师讨论，当面请教。在赴世行上任之前，只要没有离京外出，恩师一般都会参加由他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组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成员除了恩师的弟子外，还有来自研究中心的霍德明、巫和懋等老师。在发展组的讨论会上，恩师从不居高临下强迫我们接受他的观点。不过，当恩师察觉发展组成员的观点有偏差之时，他都会以极大的耐心去解释如何观察、分析现象，引发我们的思考。恩师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态度是发展组成员之间能够展开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预定晚上 10 点结束的发展组讨论有时会持续到 11 点、甚至凌晨才告结束。讨论结束太晚时，恩师通常会用夜宵来奖励所有成员。从早前北大南门的永和豆浆(现已拆除)到后来北大的西门鸡翅，都留下了我们师徒的欢声笑语。恩师喜欢甜食，有时从国外出差归来会带上一些巧克力，发展组的成员跟着沾光，品赏到了多种异国风味的美食。

即便是在世行工作期间，恩师极忙，却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对在世行做访问研究的发展组的学生们亲自进行学术指导，通常是在周五下午世行员工下班之后或是周末。这种学术讨论有时会从周日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中间就吃几块饼干。在重要的节假日期间，恩师有时还会将在美国华盛顿附近地区读

书或者工作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生们请到他温暖的家里聚会，非常关切地一一询问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近况。记得有一次恩师居然露了一手他做寿司的绝活，连同师母做的台湾牛肉面，让我们学生们在一饱口福之余惊羡不已。

恩师除了在学业上对我们这些弟子要求极其严格之外，也时刻不忘加强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人生难免会起起落落。因此，恩师一直劝勉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设定一个可以终生追求的目标；并且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能放弃对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他告诫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充满机会、也充满陷阱的时代里不致迷失方向。恩师曾在多种场合倡导：“我们必须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兴亡的责任感。因为只有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时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才能掌握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机会。”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恩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 MBA2008 届毕业典礼上以婉转的方式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了他所毕生追求的目标：“让我们以 110 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作为恩师的弟子，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被周围的人问到诸如“你们林老师当年怎么就放弃台湾那么优越的条件而只身游到大陆来”这样的问题。恩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实现“没有贫困的世界”为目标的胸襟难道不是回答上述诸类问题的最佳答案吗？

2012 年是恩师正式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旗帜，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理论思潮和研究的一年，恰逢恩师 60 诞辰。在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入门弟子精心挑选出自己和恩师合作的、与新结构经济学紧密相关的论文结集出版。春风化雨，高山仰止。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机会，代表世界各地的所有入门和私淑弟子们，向恩师一齐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生日祝福；同时也希望能借助这个文集向恩师未来要教的学弟学妹们，以及所有其他优秀青年学子们分享我们从恩师身上学知识、学方法、学做人的经验点滴；更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鼓励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与我们共同从事这项激动人心和充满挑战的重要工作。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让我们一起努力，携手并进，早日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致林毅夫教授的 60 华诞贺词

林毅夫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让我们明白中国的特殊性所在,他引导我们去思索中国经验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启示。他还是关于当前危机解决方案争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声音,他很多关于如何重振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想法都是十分有用的。

当他到达华盛顿时,他打破了一贯的模式,他是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度过大部分时光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给世行带来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拥有综合的才干,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还具有多角度分析复杂问题的综合素质。他虽然是一个东方人,却非常了解西方,所以他能够将东方与西方有机结合。

最后,祝生日快乐、会议顺利、成果丰硕!另外,请不要考虑退休,因为世界经济一直需要您。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发展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成员

非常荣幸能在您 60 岁生日之际以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以及个人的名义为您献上我真挚的祝福。

60 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在西方我们常说,过了这个年龄,您就进入老年了。奥斯卡·王尔德说过,这个年纪的人已经不再年轻,他们无法再了解所有的知识。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体验。根据中国的传统,60 岁意味着您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您将要开始新一轮的生命。请允许我说,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您一样,在此时回顾人生时,能看到如此

多的杰出成就。

无疑,您生而为龙。据我所知,龙有无与伦比的独特视角,有包涵万物之胸怀,具备常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和决断力。这恰恰就像我所熟悉的林毅夫。

您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同时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老师,您还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您作为人中之龙的领导艺术。无论是学术底蕴,还是您积极推动和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您都给世行带来了很多宝贵财富。

请允许我说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在 2011 年 5 月 4 日,您在莫桑比克发表了 WIDER 年度演讲,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国家进行演讲。您对着 400 个观众发表了题为“从飞翔的大雁到领先的龙——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的演讲。这些观众中有学生、老师、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成员,大家都被您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事后我们仍然兴奋地谈论着您的演讲。我们将这个演讲翻译成了葡萄牙语等多国文字,我们深深地感激您为此付出的努力。

您坚持认为世行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去研究和推动结构转型。经济发展问题事关重大,我们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必须勇敢地去思考这些重大问题,即使这些重大问题不见得一定符合当今学术主流。

我们问,为什么非洲缺少产业?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因为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种产业才是创造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非洲必须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巨龙不会沉睡太久。在过去 50 年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

有些国家甚至实现了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但赤贫国家依然大量存在，即使像中国这样发展迅速的国家也依然存在各种挑战，我们不能沉湎于过去的成就而不思进取。

毅夫，很幸运我们拥有您这样的人，您激励着我们，并像一条真正的巨龙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为您献上生日的祝福。

——芬·塔普(Finn Tarp)，哥本哈根大学教授，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主任

能够将这段讲述我与林教授共事经历的视频作为他 60 大寿的贺礼寄给你们，我非常开心，但我无法亲自来到林毅夫创办的研究院向他表示祝贺，对此深表遗憾。我 1991 年曾到访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那时起，林毅夫就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研究中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对于林教授关于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至少一代人高增长的观点，我深表认同，而且还曾书面提到过相同的观点。北京大学应为能够拥有这样一所声望卓著的经济研究机构而感到骄傲，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有很多人长期关注它的研究成果，甚至全美国也都在关注着该机构的研究成果。林教授，这次我不能来北京看望你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在芝加哥再次相会，欢迎常回来看看，谢谢！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林教授，60岁生日快乐。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历法里一个人生命第二轮的开始。

我们知道你在年轻时候勇敢地横渡海峡来到中国大陆，这一疯狂的举动对经济学界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你关注农业这一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随后，你探讨国有企业和经济改革等其他重要议题。同时，你在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显示出非凡的、顶尖的才能。我很清楚地记得，早年我曾受邀到CCER开研讨会，当时CCER还处在建设当中。从那以后，我见证了CCER一步步的发展，无论是在环境设施上，还是在研究的影响力和学生人数上。之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艰难时刻，你作为首席经济学家进入世行任职。我觉得世行找对了人。在世行，你从东方的视角强调由一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最优金融结构等观点，并获得了成功。全世界都愿意听你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你对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出的贡献，大家都非常信任你。现在，在人生第二轮开始的时候，你再次回到北京。我们确信你不仅仅会对经济学研究做出杰出的贡献，同时也还将在CCER为中国培养下一代的杰出经济学家，CCER最终将以他们为荣。最后，再一次向你贺寿。

——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所长，国际经济学会主席

很高兴得知您60岁的生日，我非常喜欢跟您讨论人口众多的中国为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得如此之好。我读了很多您写的和您推荐给我的书，和您讨论一些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话题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我很愿意也很高

兴通过视频庆祝您的 60 岁生日,祝您长寿,也非常期待拜读您以后的著作。
生日快乐!

——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芝加哥大学教授,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

您是一个机构的创始人,您和您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创建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非常优秀,早已名扬海内外。到访过这里的人都觉得这里是知识和灵感的源泉。

您对世界银行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您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的工作经
历对世行来说是无价之宝。您所指导和帮助撰写的《世界发展报告》非常出色,我
非常享受和您以及您团队会面的经历。

我对您在新结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深有同感。您的观点,您所构造的新结构
经济学大厦,并不是像某些国家产业经济学家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那样极端,它有
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被深深打动。因此,正如您被这一理
论选中一样,我也被这一理论所折服。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不光是
对发展本质的思考,也是对国家性质以及市场作用的经济思考,我相信它最终将会
被世界所接受。如今您回国了,这对来说是很荣幸的。我祝您在祖国事业更
加辉煌。

数十年来,您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您赠予我友谊,我想我也应该予以回报:
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祝您万事如意,祝生日晚宴成功!

——帕尔塔·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
席教授

我认识毅夫近 20 年了，15 年前我们还共同组织过 NBER-CCER 的联合国际会议。毅夫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一位优秀的国际组织领导、一位资深的中国政府顾问，而且他为人正直、诚恳。毅夫在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碰巧去世行访问多次，发现毅夫在世行同事中口碑极佳。他们对毅夫的学术和为人都赞不绝口。毅夫是我的榜样。今天我要热烈地祝贺毅夫生日快乐，而且下一个 60 年比上一个 60 年更加幸福更有成就。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

祝毅夫 60 岁生日快乐！我想我们共事已经快 20 个年头了，有时我们立场一致，有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一直认为您的工作是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

在当今这个时代，大部分经济学是在给定的框架下以一个非常狭隘的定义进行技术化的求解，而您的工作，使我们对结构、制度和历史有了更多的思考。祝您长寿，这样经济学才有希望成为更具启发性的学科，才有希望成为政策制定中一项现实而有用的学科。再次祝您生日快乐！

——张夏准(Ha-Joon Chang)，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研究顾问

目录

思想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0卷第1期)/3

新结构经济学与经济增长

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与鞠建东、王勇,《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4卷第1期)/41

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与刘明兴,《世界经济》2003年第8期)/72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与刘培林,《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96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与刘明兴,《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119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张鹏飞,《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5卷第4期)/139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经济收敛(与张鹏飞,《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5卷第1期)/161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与徐朝阳,《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182

新结构经济学与经济转型

何以加速增长 唯解自生难题——《前10年的转轨——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述评(与刘培林,《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卷第1期)/205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与刘培林,《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222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与刘明兴、章奇,《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239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与李志贊,《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258

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与徐朝阳,《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278

新结构经济学与制度选择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扭曲(与李飞跃,《南开经济研究》

2011年第5期)/309

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与潘士远、刘明兴,《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5卷

第3期)/328

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与余森杰,《经

济研究》2009年第1期)/348

新结构经济学与收入分配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与刘培林,《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

2期)/373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与刘培林,《经济研究》2003年第3

期)/403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陈斌开,《南开经济研

究》2010年第1期)/415

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与陈斌开,《世界经济》2012年第1期)/433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与孙希芳、姜烨,《经济研究》2009年第

8期)/457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与孙希芳,《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479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与孙希芳,《经济研究》2005年第7

期)/510

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与姜烨,《管理世界》

2006年第1期)/524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与章奇、刘明兴,《世界经济》2003年

第1期)/549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与李永军,《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602

资本积累与最优银行结构(与徐高,《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卷第2期)/624

新结构经济学与经济波动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643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与巫和懋、邢亦青,《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652

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与龚刚,《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675

新结构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I)(与刘明兴、刘培林、章奇,内部未公开研究资料)/703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II)(与殷伟、刘明兴、章奇,内部未公开研究资料)/742

后记/772